

近代尚力思潮述論

• 郭國燦

自從嚴復提出「鼓民力」後，尚力尚武思潮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激起大潮，有如蔣智由所言：「尚力尚武之聲……日不絕於憂時者之口也。」^①然而，綿延達半個世紀的尚力思潮，經歷了怎樣的流轉變遷和意義轉換，其思想文化淵源以及在中國從古典向現代的文化轉型中的作用等等，至今在學術界仍是一個被忽視的課題。筆者對此擬作初步分析。

一 尚力思潮三部曲

長達半個世紀的尚力思潮，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力」體現為外在的體質生命力量，主要反映在從嚴復到二十世紀初的軍國主義思潮中；第二階段，「力」向文學領域滲透，由青年魯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表現為崇尚情感、意志的「詩力」、「意力」、「強力」；第三階段，「力」向文化哲學領域滲透，也即戰國策派的「力」本體哲學。從外在的體質體力到內在的情感意志力，再到力的本體化，便構成近現代尚力思潮合乎邏輯和歷史的三部曲。

尚力思潮是伴隨着民族危機的加深，特別是甲午中日戰爭泱泱大國竟敗於「蕞爾小邦」後開始的，「甲午以前……中國為睡獅；甲午以後，則視為死獅。」^②中國知識精英開始普遍痛苦地接受了一個殘酷事實：「東方病夫」。如果說，民族危機構成了尚力思潮的現實社會背景的話；那麼，由慘敗而來的強烈「病夫」意識則作為一種強刺激，構成了尚力思潮發端的心理契機，正是在民族危機與心理危機的雙重背景下，導致了中國近代「力」的發現。

「力」的發現，基本上是從兩個層面展開的，第一個層面是「破」，即對傳統柔性文化的批判；第二個層面是「立」，即對「力」的正面闡述。

對傳統柔性文化的批判，以嚴復《論世變之極》為最早，而以蔡鐸的〈軍國

「力」的發現，基本上是從兩個層面展開的，第一個層面是「破」，即對傳統柔性文化的批判；第二個層面是「立」，即對「力」的正面闡述。



對傳統柔性文化的批判，梁啟超的《新民說·論尚武》極為系統。

民篇》和梁啟超《新民說·論尚武》最為系統。以梁氏〈論尚武〉為例，他從四個方面分析中國淪為「病夫」的原因：「一由於國勢之一統」，在大一統局面下，一片太平歌舞，四海晏然，而尚武尚力精神被視為「野蠻」的象徵，於是「其心漸馳，其氣漸柔、其骨漸脆，其力漸弱」。「二由於儒教之流失」，他認為儒家《中庸》倡導「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孝經》所謂「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加之後世賤儒襲用《老子》「雌柔無動之旨」，這樣便產生了柔性人格：以冒險為輕躁，以任俠為大戒，以柔弱為善人，惟以忍為無上法門。「三由於霸者之摧蕩」，歷代開國君主定鼎之後，深知「我可以武力奪之他人者，他人亦將可以武力奪之我也」，於是採取軟硬兩手政策，其結果便是「人心死矣！」。「四由於習俗之濡染」，在這種柔性文化中，人們普遍的價值取向是「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軍人被視為「惡少無賴之代名詞」和「不足齒之儉父」。

應該承認，梁氏言辭之間，固然難免憤激之偏頗，但卻是近代中國對古典柔性文化一次比較系統的理性反省和批判。他告訴人們，造成「東方病夫」現狀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有政治因素，如封建大一統與專制君主的獨裁限制，也有精英文化的因素，如儒道互補的中國文化，更有通俗文化的價值取向和習俗薰染等問題。

從「立」的層面看，1895年嚴復在天津《直報》上推出〈原強〉篇，最早吹響了「鼓民力」的號角。他把斯賓塞的“physical education”（體育）轉譯成「力」或「體力」，從而在士林文化中，第一次把孔子以來（子不語怪力亂神）遭受鄙棄的「力」抬高到與「開民智」、「新民德」的同等地位。這也是中國近代關於「德、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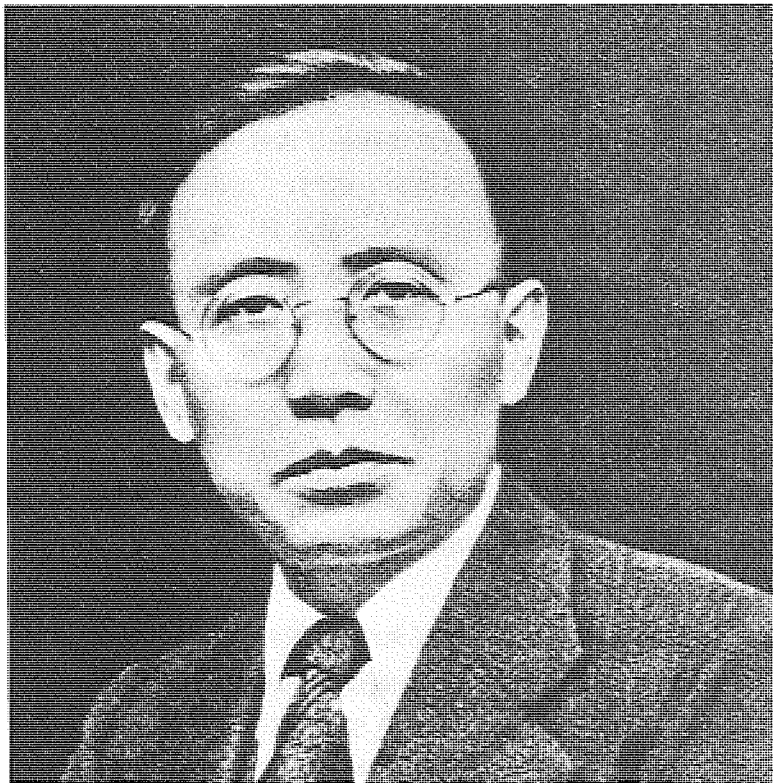
力(體)人的全面發展的第一次理論概括。「力」的發現，也就是「體育」的發現，就是生命本質的發現。從此以後，「有志之士，乃匯集同志，聘請豪勇軍師，以研究體育之學。」^③稍後，梁啟超更進一步展開「力」的豐富內涵，他在《新民說·論尚武》中認為，「力」有三種形式：「心力」、「膽力」和「體力」。譚嗣同一生崇尚力量，他在《仁學》中更開列出十八種「力」(如「拒力」、「銳力」、「韌力」等)，的確是近代尚力思潮中的一個文化奇觀。尤其在二十世紀初的軍國主義思潮中，人們普遍相信：「宇宙間發生種種之現象，無不有力之存在」，而在生命世界中，也是「處處充滿着一種力」^④。因此軍國主義思潮極力提倡「壯健力」、「堅忍力」和「精勤力」，並把尚武尚力的軍事體育作為其核心主題。對此，蔡鐸(奮翮生)在《軍國民篇》中深有感觸地說：「嚴子之〈原強〉，於國民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之中，尤注重體育一端，當時讀之，不過謂為新議奇章。及進而詳窺宇內大勢，靜究世界各國盛衰強弱之由，身歷其文明之地，而後知嚴子之眼光之異於常人，而獨得歐美列強立國之大本也。」救亡一尚武一體育便成了軍國主義思潮鼓吹者的一般的思維邏輯：「力」即體質體力便肩負着救亡圖存的重任。

然而從青年魯迅開始，在軍國主義尚武尚力思潮之外，「力的發現」又伸向了另一個領域，即從肉體生命的外在自然基礎——體質的「力」轉為對生命內在情感意志力量的推崇，從「體育」開始向「文學」領域滲透。這就是魯迅發其端的五四文學對「詩力」、「意力」、「強力」的推崇。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把「詩力」視為一種審美化了的生命情感的力量，而在《文化偏至論》中，則把「意力」、「強力」視為一種生生不已、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衝動。這就如尼采所言：「生命為個體追求力量的最高感覺，生命本

然而從青年魯迅開始，在軍國主義尚武尚力思潮之外，「力的發現」從體質的「力」轉為對生命內在情感意志力量的推崇，從「體育」開始向「文學」領域滲透，這就是魯迅發其端的五四文學對「詩力」、「意力」、「強力」的推崇。

郭沫若在其詩作中，對「力」一詠三嘆。



質上是追求更多的力量。」^⑤魯迅堅信：「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闢生路者也。」

這幾乎是先知式地預言了生命力量的審美化時代的到來。到了五四時期，十年前魯迅對「詩力」、「意力」、「強力」的弘揚在文學界獲得更普遍的回應，郭沫若在〈我是一個偶像崇拜者〉一詩中，表達了其對「力」的崇拜：「我崇拜創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臟」，而在〈站在地球邊上放號〉篇中，對「力」更是一詠三嘆。狂飆社的向培良在〈水平線下〉一詩中也發出「力」的呼喚，創造社的王獨清更直接地把「力」視為詩的本質要素：（情+力）+（音+色）=詩^⑥，「情+力」作為一種審美的感性生命與魯迅的「詩力」一脈相承：在衝創奔突的感性生命衝動中，以男性的陽剛之美衝擊柔性文化藝術中那種「才子佳人旖旎冶獠之柔情」、「靡曼亡國哀思之鄭聲」，一掃古典《西廂記》、《紅樓夢》裏纏綿於怡紅院、瀟湘館裏非男非女、無病呻吟的張生、寶玉型的雄性雌化氣質。正是在五四文學作品中，我們能感受到尼采式的「高原空氣」的「衝飆」，惠特曼的激昂、高亢而撼動靈魂的音響，拜倫式的「所向必動，貴力而尚強，尊己而好戰」的「如狂濤如厲風」的摩羅精神……總之，雄性氣魄、陽剛精神迅速蔓延到五四文學界，從而構成五四作品的一種生命基調。

如果說，五四作家的尚力思潮着重於生命力量的審美化的話，那麼抗戰時期的戰國策派則將「力」推進到文化哲學領域並建立起「力」的本體論。

林同濟認為，生命的本質即是「力」，「力即是生，生即是力」，由此可引申開去：「中國『動』字從力，是大有意義的。一切的生者要動，一切的動都由於『力』」，因此「生、力、動三字可說是三位一體的宇宙神秘連環」。這就是說，力不僅是生物的本體，而且，力量、生命和運動三位一體構成宇宙本體。林甚至認為，「力」也是精神的本體，因為精神超越的根本在於「創造」，而「一切的創造只是力的表現，活力的自成」^⑦。所以說，「力量是一切的中心，它破壞一切，建設一切」^⑧。至此，近代尚力思潮完成了從體質（體育）到審美（文學）到本體（哲學）的三部曲，標誌着近代「力的發現」的一步步深化，也展示了近代人們對生命力量的執着追求。

尚力思潮是伴隨着進化論哲學、尼采哲學和摩羅文學等的傳播而興起的；同時，它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發掘本民族傳統文化進行「力」的文化尋根的結果。

二 思想借鑒與文化尋根

從思想與文化淵源來看，尚力思潮是伴隨着進化論哲學、尼采哲學和摩羅文學等的傳播而興起的；是在斯巴達精神、日耳曼文化、大和文化和近代體育等具有強烈尚力、尚強和尚武精神的異質文化的傳入後而擴大其影響的；同時，它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發掘本民族傳統文化進行「力」的文化尋根的結果。

（一）進化論哲學和尼采哲學分別構成了尚力思潮各階段的理論前提。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士在《實用主義》一書中，曾把哲學分為「剛性」和「柔性」兩種性質。而進化論哲學與尼采哲學恰恰是近代尚力思潮鼓吹者輸入的兩種「剛性」哲學。前者構成了尚力思潮第一階段的理論前提。

進化論哲學與尚力思潮的聯繫，這不僅因為尚力思潮的始作俑者嚴復的

文化偏至論

中國既以自尊大昭聞天下，善謀者或謂之頑固，且將抱守殘陋，以底于滅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學之語，則亦引以為愧，翻然思變，自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指其舊物，惟恐不力，曰：將以革前變而圖富強也。同輩論之，昔者帝軒轅氏之戡蚩尤而定居于華土也，典章文物，予以權輿，有苗裔之繁衍于茲，則更改張皇，益臻奕奕大，其靈靈于四方者，皆蕞爾小蠻夷耳，厥種之所創成，无一足為中國法，是故化成發達，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臘羅馬起，藝文思想，灿然可觀，願以道路之規，波濤之惡，交通梗塞，未能擇其善者以為師資。洎元明時，虽有一二景教大師，以教理暨曆算質學于中國，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開，漸人踵至之頃，中國之在天下，見夫四夷之則效上國，革面來賓者有之；或野心怒發，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誠足以相上下者，蓋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讎，則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視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極者矣。虽然，惟无校讎故，則宴安日久，零落以胎，迫撈不來，上征亦弱，使人恣，其極為見善而不思式。有新國林起于西，以其殊異之方術來向，一施吹拂，然暗視，人心始自危，而豈才小慧之徒，于是竟言武事，后有學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國之情，遠复不察歐、澳之實，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謂鉤爪鋸牙，為國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語，用以自文，征印度、波蘭、作之前鑑。夫以力角盈絀者，于文野亦何关？近之則羅馬之于东西，戎、狄之則中國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离距為何如，決之不待智者。然其勝負之數，果奈何矣？苟曰是惟往古為然，今則機械其先，非以力取，故勝負所判，即文野之由分也。則曷弗后人智而开发其性，冥使知習狃戈矛，不过以御豺虎，而喋喋蒼白人肉攫之心，以為極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且使其言矣，而舉國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嗟夫，天子豈以习兵事为生，故不根本之固，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且兜牟深隱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祿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計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前二者意见重于中国昔

- 39 -

「剛性」的尼采哲學直接為力本體哲學提供了理論基礎。對尼采哲學的介紹，早在辛亥革命前已開始，以魯迅的〈文化偏至論〉最具代表性。

「鼓民力」思想直接來源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哲學家斯賓塞的《教育論》；更主要在於進化論哲學本身便是一種崇尚強者、優者的哲學。按照嚴復傳播的進化論思想，「物競」與「天擇」原理導致的結果便是「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因此，「人欲圖存，必用才力心思，以與是妨生者為鬥」（〈原強〉），只有那些具備「血氣體力之強」、「聰明智慮之強」、「德行仁義之強」的人才能在「物競天擇」的自然選擇和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中立於不敗之地，成為強者、優者。同樣，只有那些由民智、民力和民德皆優的強者組成的民族和國家，才能成為強國、強大的民族。嚴復正是從「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進化論哲學中導出了「鼓民力」的尚力思想。

尼采哲學直接為五四感性啟蒙和戰國策派的力本體哲學提供了理論基礎。對尼采哲學的譯介，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開始了，以魯迅的〈文化偏至論〉最具代表性。魯迅的「摩羅詩力」精神主要是吸收了摩羅文學的「詩力」和叔本華、尼采的「意力」—「強力」意志。「意力」本是叔本華哲學的一個核心觀念，即強調意志是一種不可遏制的盲目的生命衝動，它構成了世界的本體；但尼采卻將叔本華的消極遁退的悲觀主義「意志」改造為一種積極為雄、拓展生命狂瀾的積極進取的強力意志。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正面接納了尼采的「強力」擴張的個性主義和超人精神。如果說，魯迅從摩羅文學的「詩力」中，尤其是拜倫的「一劍之力」中，導出了對生命情感力量的弘揚的話，那麼，從尼采的「意力」—「強力」哲學中，則導出了對生命意志力量的崇尚和禮讚，並達到了生命的審美超越。而戰國策派則更是通過尼采強力意志建立起力本體哲學。

（二）古希臘斯巴達精神、日耳曼文化、大和文化和西方近代體育等異質文化，構成了尚力思潮的文化借鑒和參照。二十世紀初在留學生運動中興起的軍國主義思潮，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角色意識，尤其改變了

「子不語力」的儒家傳統和尚柔守雌的道家傳統。他們高揚生命、力量，推崇冒險、進取、競爭、耐力和強力，充斥在革命派報刊中的是對俄國虛無黨的暗殺、恐怖、匕首、炸彈等尚武尚力的個人英雄主義行動的崇拜。而這一切又使他們把目光投注到古老而遙遠的斯巴達精神、近世日耳曼鐵血主義和大和精神。

他們認為，軍國民主義「昔濫觴於希臘之斯巴達，汪洋於近世諸大強國」^⑨。在梁啟超的〈斯巴達小志〉和魯迅的〈斯巴達之魂〉諸文中，斯巴達精神被概括為：第一，尚武精神為立國第一基礎；第二，教育專重體育；第三，以流血為榮，以流淚為恥；第四，以軍事為修身唯一之目的。而發表在《雲南》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也認為，斯巴達以「彈丸之國、人不滿萬」竟能「嶄然勃起」的原因就在於：「軍人之教育」、「忍勞耐苦」、「鍛煉淬礪」、「凌風雨，冒寒暑、摠患難艱險而不辭」^⑩的軍國民主義精神。與此同時，人們也普遍推崇日耳曼民族「乃以鐵血主義成為世界上莫強之國。」^⑪壯游在〈國民新靈魂〉中就宣稱：「鐵血者，神聖之所歆；劍銃者，國民第二之衣食位」。而日本人「亦莫不以大和魂三字自矜，大和魂者，日本尚武精神之謂也。」^⑫

軍國民主義者不僅引入了異質文化精神，而且也進入了行動操作層面，即開始引入西方軍事體育，開展體育運動。軍國民式體育的特點是把體育運動作為一項軍事運動來開展的，強調體育、體操和軍事為三位一體，如1903年留日學生成立的軍國民教育會，其「課程」便分為「三部」：一，射擊部（打靶、擊劍）；二，體操部（普通體操、兵式體操）；三，講習部（戰術、軍制、地形、築城、兵器）。而且，留日學生的軍國民主義思潮迅速流佈於國內，上海等地紛紛成立「體操會」、「體育會」和「尚武會」。比如上海人士「有鑒於國民軀體羸弱」，於是「發起組織體育會，鍛煉體魄，研習武課，冀成干城之選」^⑬，於1905年成立了上海滬學會體育部、商餘學會、商業體操會、商學補習會、滬西士商體操會五個組織，號稱「五體操會」。次年蘇州也成立了蘇商體育會，「演習體操，以健身衛生為始事」^⑭，教習柔軟體操和兵式體操，並練習打靶，還擔任巡梭和維持治安等任務。1911年，浙江寧波國民尚武分會以「提倡武風，挽救文弱」為宗旨，其體操團則明確強調「實行尚武，養成健全軍國民」。與此同時，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舉行運動會，北京、江蘇、奉天、四川等地都舉行了全省性學生運動會。而運動會的目的乃是因為「我國數千年之積弊莫患於右文而輕武」，他們認為，「國家之盛由於兵，強兵之道，由於國民尚武，而尚武之風實始於學堂運動會焉」^⑮，因此，「振起我國學生尚武之風，必以此為藥石矣」^⑯。

（三）本民族傳統尚武尚力精神構成了尚力思潮的文化之根。憧憬異域，但並不妄自菲薄，而是返顧於本民族發掘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根，這是軍國民主義提倡者一個可取的基本態度。

在傳統文化中，有兩股非主流文化在近代尚力思潮中受到了青睞。一股是精英文化中的非主流派墨家以及晚近時期的經世學派的顧炎武和顏李諸哲學家。與儒道反力尚柔相反，墨子強調「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墨子·非命下》）。墨子

二十世紀初在留學生運動中興起的軍國民主義思潮，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角色意識，尤其改變了「子不語力」的儒家傳統和尚柔守雌的道家傳統。

軍國民主義者不僅引入了異質文化精神，而且也進入了行動操作層面，即開始引入西方軍事體育，開展體育運動。

對「力」、「強」的推崇，重視實踐、勞動和身體力行的精神，在近代幾乎激起了一股「墨學復興」思潮，梁啟超甚至說：「今欲救亡，厥惟學墨」（〈子墨子學說〉）。譚嗣同策馬踏勘祖國大江南北、邊疆塞北，青年毛澤東在湖南徒步旅行、冬天以冷水淋浴，都曾以「摩頂放踵」的墨子精神自勉。對經世學派的推崇，集中體現在青年毛澤東〈體育之研究〉一文中。該文貶儒道釋而揚顧、顏、李諸人，鄙棄「僂身俯首，纖纖素手，登山則氣迫，步水則足瘳」的「短命顏子」，而推崇「任重革死而不厭」的「燕趙悲歌慷慨之士」，十分欣賞顏習齋、李剛主「學擊劍柔術於塞北」、文而兼武的風格，推崇顧炎武「不喜乘船而喜乘馬」精神。傳統精英文化中的非主流派在近代構成了尚力思潮的源頭活水。

另一股則是以「遊俠」階層為代表的山野文化。顧頤剛先生曾在〈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一文中認為，在古代，最初是文、武不分，至春秋時期開始分歧為二，「憚用力者歸『儒』，好用力者為『俠』，所業既專，則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極端之表現耳。」隨着大一統專制統治的確立，統治者往往尊「儒」而反「俠」，至漢武帝時期，遊俠階層幾被鋤盡。但是到近代，思想界開始出現反「儒」而倡「俠」的文化轉向。譚嗣同便一生「好為任俠」；壯游在〈國民新靈魂〉一文中倡「遊俠魂」而反儒。他認為，中國淪落病夫狀態，「儒之罪哉！」而俠則「重言諾輕生死，一言不合拔劍而起，一發不中屠腹以謝」。所以「國亡於儒興於俠，人死於儒而生於俠」。揆鄭的〈崇俠篇〉也表達了同樣的意向。他們歌頌遊俠那種「易水蕭蕭，落日荒涼，親朋咽淚，至以白衣冠饒送」的壯士一去不返的悲壯場面，欣賞那種「酒酣拔劍，擊筑高歌，怒髮上指，氣薄虹霓」^①的大丈夫氣概。為此，梁啟超輯錄了春秋至漢代的「好氣任俠」的遊俠壯士荊軻、聶政之流，以成《中國之武士道》一卷，以激勵國民的任俠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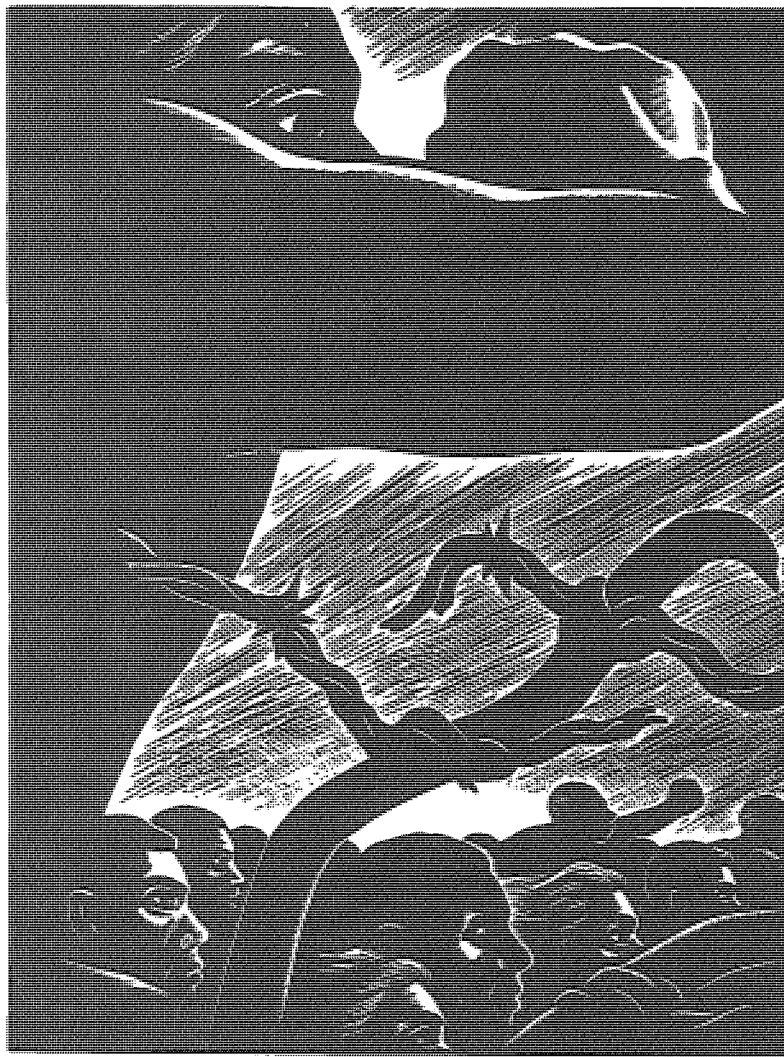
在發掘遊俠文化的同時，人們更直接從山野文化中尋找力量，一位署名「可權」的作者從王船山的《黃書·宰制篇》中，輯錄了大量有關中國邊遠地區民俗尚武「野蠻」的材料，以尋求中國士林文化久不復存在的生命野性力量，以呼喚那些可以為「扞御之資」的「冒險進取」之士、「堅忍耐勞」之民、「猿接猿跳」^②之徒。《直隸白話報》的作者亦號召直隸人民繼承直隸先民「燕趙悲歌」的尚武精神和粗獷氣質，以掃蕩積弱已久的「柔弱的風氣」。1906年成立的蘇州商會體育會亦以「尚武好俠」的「三吳古風」激勵其會員。總之，被柔性文化沉埋已久的尚武傳統被發掘出來，獲得了新的生命。

三 重建國魂：感性生命的重建

以斯巴達精神、日耳曼鐵血主義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為傳播內容的軍國主義和以尼采哲學為基礎的力本體哲學，曾被指斥為鼓吹武力征服、侵略擴張、宣傳種族優越的黷武主義、軍國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然而，人們卻往往忽視其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正面意義。

我們不妨先考察尚力思潮的主導目標。戊戌以後，當中國知識精英從一系列軍事慘敗中開始接受「病夫」意識的時候，他們的主導目標便開始明確化：重

在發掘遊俠文化的同時，人們更直接從山野文化中尋找力量，被柔性文化沉埋已久的尚武傳統被發掘出來，獲得了新的生命。



當中國知識精英從一系列軍事慘敗中開始接受「病夫」意識的時候，他們的主導目標便開始明確化：重建中國國魂。

建中國國魂。重建國魂的思想始於嚴復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思想，而最早明確召喚「國魂」的當推1899年梁啟超發表在《清議報》上的《自由書》中一篇〈中國魂安在乎？〉，他強調「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他把「國魂」歸結為「兵魂」。進入二十世紀，呼喚國魂便成為一種時代的聲音，如1903年刊於《浙江潮》的〈國魂篇〉和刊於《江蘇》雜誌的〈國民新靈魂〉等就擴展為「山海魂」（冒險魂）、「軍人魂」（武士魂）、「遊俠魂」、「宗教魂」、「魔鬼魂」、「平民魂」（社會魂）等等。到新文化運動時期，那就是對自由獨立的個體人格的追求，即魯迅所謂「首在立人」和改造國民性問題。而這恰恰構成了尚力思潮的主導目標。

事實上，重建國魂的工作是從戊戌以後開始的。具體說來，就是以倡導科學理性和民主政治為特徵的理性精神的重建和以「尚力」為特徵的感性生命的重建。近代感性放蒙要求人們從尚柔主靜重德輕力的中世紀儒道文化圈中走出來，重新確認生命本身的意義和價值，重新確認外在肉體感性。也就是說，生命就是力量，生命既是自在狀態，又必須通過個性化的情感和意志來擴展、豐富、創造和超越自身，這種超越突出體現為審美超越。因此生命作為感性的動力系統包括三個層面，強壯健康的生命肌體；以個性為基礎的豐富情感和非凡

重建國魂的工作是從戊戌以後開始的。具體說來，就是以倡導科學理性和民主政治為特徵的理性精神的重建和以「尚力」為特徵的感性生命的重建。

這種以「野蠻」相標榜，以軍事體育為手段的軍國主義思潮，標誌着中國感性精神重建的開始。

近代，顏元「四海潰爛」之說不幸而言中，中國國民從體質到精神都淪落到「東方病夫」的地步，正是從這時起，一股強大的尚力思潮勃然興起。

意志力；感性的超越——審美超越。軍國主義從根本上來說，構成了感性啟蒙的第一個層面：追求健康強壯的生命肌體，肯定肉體的感性生命力量。軍國主義者認為，在傳統文化氛圍中，「俗師鄉儒，乃授以仁義禮智三綱五常之高義，強以龜行蠃步之禮節，或讀以靡靡無謂之詞章。不數年，遂使英穎之青年，化為八十老翁。」一個英穎活潑的青年，經過一番文明的陶冶，「道德」增長了，而生命卻萎縮了，這的確是儒家文化的悲劇。軍國主義從根本上觸及到道德與生命的悖論性衝突，意識到儒家倫理對生命的約束和壓抑，於是軍國主義便濃縮為這樣一個口號：「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蠻其體魄」。戊戌辛亥時期對「野蠻」的禮讚，對先民尚武精神的「尋根」，不是要求倒退到先民時代，而是意在拯救過分倫理化、過分文弱化的感性生命，使之卸掉身上「太人性化」（尼采語）的沉重的文明負擔，重返生命的自在狀態：生命本能的充盈和感性肉體的力量，以此來重整中國國民的病夫狀態。這種以「野蠻」相標榜，以軍事體育為手段，以強健的外在肉體感性生命為目的的軍國主義思潮，標誌着中國感性精神重建的開始。隨着五四前後尚力思潮向文學領域的滲透，感性啟蒙進入了更高層次，即魯迅首倡、五四作家呼應的「詩力」、「意力」、「強力」精神的誕生，從而開始了對個性化的生命情感意志力的高揚。而且魯迅借尼采的「超人」達到了生命的超越即審美超越，也即魯迅所說：「思慮動作，咸離萬物，獨往來於自心之天地」，這是一次人的生命意志的提升，也是感性生命的最高境界。當戰國策派建立力本體哲學時，近代感性啟蒙便獲得了一次系統的哲學形態。因此，長達半個世紀的尚力思潮，標誌着中國近代感性精神的重建，標誌着古典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過渡。具體說來，可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從尚柔到尚力、從養生精神到體育精神。中國傳統文化中，從精英文化層面看，無論是老子的尚柔守雌，還是孔子的不語力，無論是先秦儒學還是宋明儒學，都表現出強烈的反力尚柔重德輕武傾向；而從實踐操作層面看，則表現出重養生而輕體育。傳統文化這種反力尚柔主靜重德輕武的偏向，在封建社會後期，便引起一些敏銳的思想家的懷疑和指斥。到近代，顏元「四海潰爛」之說不幸而言中，中國國民從體質到精神都淪落到「東方病夫」的地步，正是從這時起，一股強大的尚力思潮勃然興起。近代思想界通過輸入西方和日本斯巴達精神、武士道精神、鐵血主義、強力意志等陽剛精神，來盪滌中國幾千年來存留下來的陰柔之氣，並以此來改造中國國民的羸弱體質與精神。於是開始了從文、儒、柔、靜、雌、弱向俠、力、武、動、雄、強、野、競的觀念轉換。同時也引入了現代體育，不僅引進體育運動項目，更主要是使人們的體育觀念發生變化。隨着體育在中國逐漸普及，便滋生一種嶄新的體育精神：崇尚力量、時間意識、競爭意識、拼搏精神、競賽規則的公平意識……。雖然在當時遠未形成自覺意識，但畢竟有了某種萌芽。

第二，從「和為美」到「力為美」。中國古典美學的審美理想是「中和為美」。如《禮記·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種「中和」的美學精神從根本上體現了儒家善即是美，以善代美的思想。近代尚力思潮，不僅倡導體質改造，而且也是一種審美意識的轉換，一次人在審美意

義上的提升，這就是「力為美」意識的出現。在五四時期，人們不再是在生命兩極(情感與理智)的調和、妥協、退讓、萎縮中，企求一種「中和之美」，而是在生命的兩極衝突中，再現感性生命的力量：意志力與情感的力量，都標誌着「中和之美」的被打破，一種生命為美、感性為美、力為美的現代審美意識的誕生。

第三，從弱者哲學、中庸哲學到強力哲學。中國國民從精神到體質都淪落到近代「東方病夫」的地步，與儒道的弱者哲學、中庸哲學不無關係。無論儒道，都無法衍生出一種「力」的哲學、強者哲學，並且根本上是反強者人生的。尚力思潮是反平庸、反弱者哲學的，它提倡的「強者」必須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在人的生理機能方面，必須具有強健的體魄、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量；(二)以個性主義為基礎的情感的足夠充盈和強烈衝創的意志力；(三)正是在這種生命情感和意志力的不斷衝創中昇華為精神超越。這三層次約略相當於梁啟超的「體力」、「膽力」、「心力」。這種強力哲學的提出，衝擊着儒道的弱者哲學和中庸哲學，提倡感性和個性，提倡永無止境的奮鬥哲學、不斷超越自身的生命哲學，從而改造「東方病夫」般的精神和體質。

在五四時期，人們不再是在生命兩極的調和、妥協、退讓、萎縮中，企求一種「中和之美」，而是在生命的兩極衝突中，再現感性生命的力量。

註釋

- ① 《中國之武士道·蔣序》，《飲冰室合集》專集冊6。
- ② 愛國青年：《教育界之風潮》第七章(1903)。
- ③ 歐陽甲：《論政變與中國不亡之關係》，《清燭報》冊27(1899年9月15日)。
- ④ 高勞：《力之講節》；屠峰：《力的世界》，《東方雜誌》卷13，6號；卷19，6號。
- ⑤ 引自陳鼓應：《尼采哲學家尼采》(三聯，1987)，頁93。
- ⑥ 《再致詩》，《中國現代詩論》上編(花城出版社，1985)，頁104。
- ⑦ 林同濟：《力！》，《戰國策》(昆明版)期3(1940)。
- ⑧ 陳銓：《狂飆時代的序曲》，《戰國策》期14(昆明版)。
- ⑨⑩ 蔡輝：《軍國民權》，《壬寅新民叢報》匯編本(中)，頁569。
- ⑪ 憂患餘子：《論漢省官仿照北洋舉辦征兵》，《雲南》1號。
- ⑫ 蔣百里：《軍國民之教育》，《壬寅新民叢報》匯編本(中)，頁579。
- ⑬ 《上海商團小史》，《辛亥革命》(七)，頁86。
- ⑭ 《蘇商體育會史料輯》，蘇州市檔案館編：《蘇州商團檔案匯編》(未刊)。
- ⑮ 《運動會盛觀》，《盛京時報》(1906年11月17日)。
- ⑯ 《學堂異彩》，《滬報》(1905年11月5日)。
- ⑰ 撰輝：《崇俠篇》，《民報》期23。
- ⑱ 《改良風俗論》，《東方雜誌》卷1，7號。

郭國燦 1963年1月生，歷史學博士。現在深圳市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從事特區社會經濟發展與比較現代化研究。曾發表〈移民精神與鄉土意識〉、〈新時期十年史學主潮的邏輯演進〉等論文多篇，主要論著有《中國近代人文精神的重建》(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論叢》即將出版)。